

上图：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陶铸，第四人为杨学诚(1939年)



中图：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朱理治，中为陈少敏，右为李先念，后排右一为刘少卿，右二为郑绍文(1940年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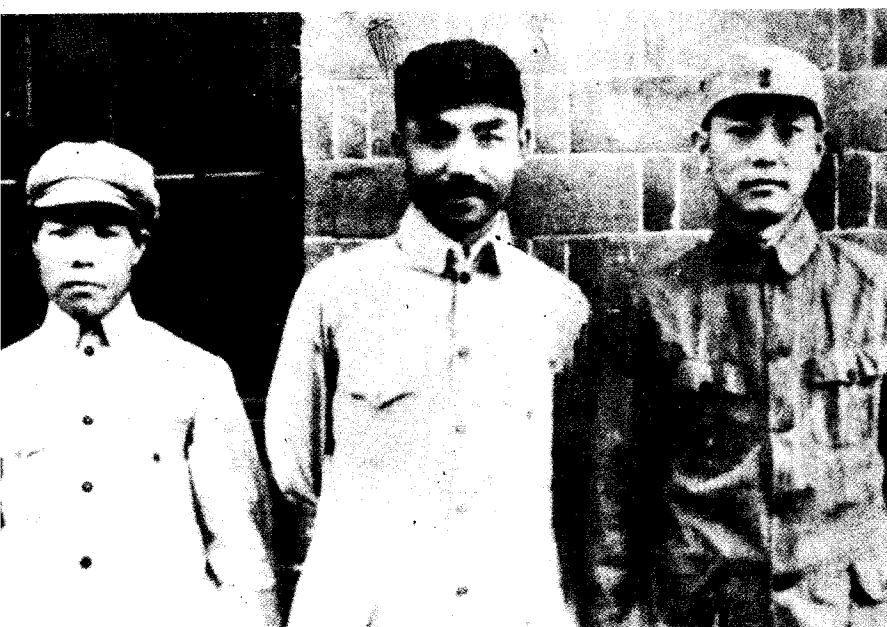
下图：前排左起第二人为任质斌(19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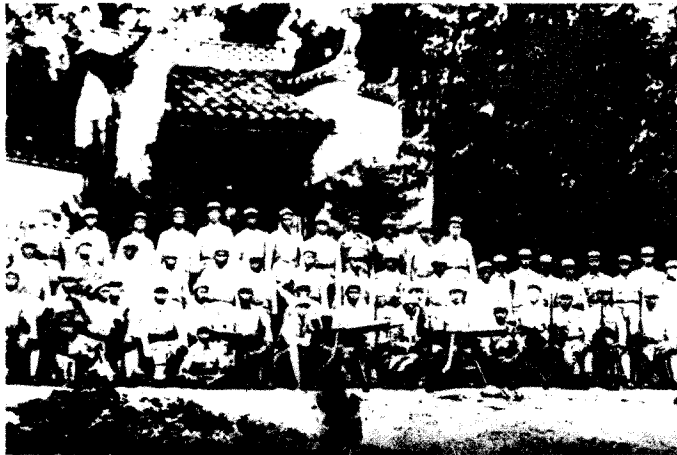
上图：左为李先念，中为郑位三，右为任质斌(1944年)

下图：左为陈少敏，中为郑位三，右为李先念(1944年)





上图：1945年1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五师胜利会师时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任质斌、王首道、王震、陈少敏、李先念



中图：新四军第五师某部机枪连

下图：五师战士在开荒生产





图为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军校学员在听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讲话(1940年)



图为李先念师长等与美军14航空队情报组部分成员在师部驻地大悟山的合影(1944年)。前排左起第三人为李先念，第五人为本照片的提供者保罗·比格勒

# 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 边区革命史的几个问题\*

(代序)

李先念

## 一、要写党的路线正确，不要突出个人

五师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正在向前发展。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中央的指示，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华北地区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深入大江南北敌后，创建根据地。这种形势，对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抗

---

\* 1982年和1983年，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从事编写革命史工作的几位同志，曾三次看望先念同志。在交谈中，先念同志对编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讲了几个问题。这是他的谈话摘要。

日武装力量和创建根据地，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抗战初期，王明到武汉，领导长江局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没有充分利用武汉沦陷前的宝贵时间，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没有准备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这次全会后，党中央派我们到鄂豫边区，就是要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路线，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党组织和部队坚决执行了中央路线，认真消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师的创建、成长、壮大和取得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因此，写这段历史应该把功劳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归于广大人民群众英勇奋斗，决不要突出个人。

## 二、要写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

五师的迅速成长和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充分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我们始终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坚持依靠群众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很注意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我们对国民党各派势力，区别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正确掌握党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我们和李范一、李相符、李德纯、孙耀华、蔡韬庵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实行了真诚合作。在我到鄂豫边区之前，信阳

地区的党组织和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合作，已共同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蔡韬庵也有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李范一、李相符等人组织了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和帮助。孙耀华由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派当了应城县长，在建立应城抗日游击队的过程中，同我们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李德纯等人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

我们积极争取西北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友好相处。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方面给过我们一些援助。他们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命令时，总是事先向我们打招呼，从未发生过真的武装冲突，有时还供给我们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川军孙震的部队虽然同我们搞过一些磨擦，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他的部下有一位师长叫陈离（静珊），和我还是好朋友。我在他的师部住过好几天，他送给我们地图和一些枪支、弹药等。在当时来说，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小的。团结和合作都是互相的。当友军同日军作战时，我们也尽量给予帮助。例如，1940年5月，川军125师的一个团在安陆李家冲被日军包围了，我们主动驰援，使其得以安全突围。桂军是国民党军队留在大别山区的主力，抗战初期同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我们的一些党员和革命进步青年参加了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但是，当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时，桂军就开始同我

们磨擦，打我们，杀我们的人。在抗日战争中期搞磨擦比较多，后期又稍好一点。就整个桂系来说，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但当他们一旦坚决执行国民党当局反共命令时，我们从自卫立场出发，也坚决予以还击。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我们对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鄂中)专员石毓灵这样的国民党顽固派，则进行了针锋相对和恰如其分的斗争。我到鄂中时，曾见过石毓灵，他表面上装得很客气，但是对我党我军竭尽污蔑之能事，又搬出来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那些陈词滥调。他还问我，知道不知道王鉴这个人，我说当然知道，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黄安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的很有名的一位领导人。石毓灵说：“那个人可厉害了，天有王鉴，日月不明；地有王鉴，草木不生；人有王鉴，胆战心惊。”对他的这种恶意攻击、诽谤和挑衅，当然要给予严厉驳斥。后来的几次反共高潮，他都积极参加了。安陆有一个国民党游击支队长杨弼卿，开始和我们合作抗日，后来受顽固派的拉拢和收买，同我们的矛盾尖锐起来，向我白兆山根据地进攻。因此我们决定打击他，一打就把他俘虏了。然后我们又客气地待招他。我说：“我们是朋友，你太对不起人了，不该同我们作对！”说得他羞愧无言。临走时他要求给他几支手枪。我说你要枪，国民党顽固派会缴去的。他说不要紧。我们就给了他十五支手枪。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果然把他的枪全部缴去了。我们的原则是，顽固派如果助敌反共，破坏抗日，就坚决消灭他们。对应城的李又唐就是这样。但在同顽固派作斗



争时，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把事情做绝，既显出我军的军威，又尽可能争取他们一致对外。

在鄂东地区对李九皋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程汝怀的斗争，也有很多生动的事例。

### 三、要写大胆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鄂豫边区是中日两军相持的前线。日军对城市和交通沿线控制很严，对广大农村控制就差一点。我们到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仅能有力地打击日伪军，而且顽固派要搞我们也不容易。如果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必然要同他们闹矛盾，影响两党合作抗日，人民也不愿意，而且搞不好有被顽固派消灭的危险。因此，要不要深入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留恋国民党统治区，不愿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派我和周志坚等同志率领一百多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向豫鄂边敌后挺进。不久，陈少敏、朱理治和任质斌等同志也先后率领部队从竹沟出发南下，同我们会合在一起。我们到了敌后，确实发展很快。这当然同这个地区原来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有关。还在徐州沦陷、武汉危急时，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的指示，中共河南、湖北省委就曾派

了一批干部到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是抵制了王明的错误的。我们南下同豫南等地的武装力量先后会合，根据中央的战略方针，说服动员一些同志坚持敌后或转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我们到信阳敌后地区的四望山，同危拱之、刘子厚、文敏生、王海山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合时，要他们坚定不移地在豫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我们到京汉铁路东面大别山地区的狮子口，同罗厚福、贺建华等同志领导的6大队会合时，听说张体学、刘西尧等同志领导的5大队和李丰平、郑重等同志领导的8大队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就立即让贺建华同志想法告诉他们转到敌后去，不然有被消灭的危险。我的意见当时不知转达了没有。5大队原来叫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他们对国民党顽固派是有警惕的。1938年12月，鄂豫皖区党委为了使这支部队取得合法名义，以便解决给养问题，经过同桂军谈判，才改称为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防区在麻城的夏家山一带，和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挨着。1939年9月，正当5大队准备转移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命令部队向夏家山等地发动进攻，致使5大队和地方党组织及群众遭到一些损失。5大队在“夏家山事件”发生后，迅速转移到敌后，发展很快。8大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转移，结果几乎全部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了。我们到敌后孝感中和乡地区，原红四方面军伤残干部许金彪同

志在那里组织了五百人枪的队伍，诚恳表示听从党的指挥。到应山，杨焕民同志带领一支队伍也找到了我们。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们就把几支分散的小股部队，汇集成为一支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部队，并成立了鄂豫边地区的第一个主力团——新四军挺进团。

#### 四、要写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我和周志坚同志率领的这支队伍，从竹沟出发就用的是新四军的番号，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挺进到鄂豫边区更坚定不移地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在这以前，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搞起了几支武装力量，为了取得“合法”名义，除6大队外，都还没有打出我们党所领导的新四军的旗帜。1939年春，我们挺进到鄂中，同陶铸、杨学诚、许子威、蔡松荣、郑绍文等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了。陶铸同志在武汉沦陷前，就到了鄂中，在应城汤池创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利用这一公开形式，培养了一些抗日骨干。武汉沦陷后，他和杨学诚等同志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发动游击战争。我们到鄂中不久，陈少敏同志从竹沟带一些干部和二百余战士也来到了安陆的赵家棚。1939年6月间，我们在京山的养马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日形势，研究了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的问题。经过认真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取消利用国民党或其他势力的部队番号，统一和整编豫南

和鄂中两地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了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高举起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旗帜，解决了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陶铸同志没有能参加这次会议。杨学诚同志在会上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肯定。这次会议，对五师和边区的创建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同它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国民党，不能它让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让干就不敢去干。总之，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我到鄂豫边不久，就看到了国民党中央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我们不理它那一套，放手发展自己的抗日力量，壮大自己的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当国民党军队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一方面公开提出强烈抗议，揭露顽固派的罪行，教育人民和部队；另一方面随时进行自卫战争，坚决打击那些专门吃磨擦饭的家伙。我们的这些做法，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给东南局的指示，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给予了充分肯定。

#### 五、要写党的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1939年11月“竹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在这之前，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朱理治、任质斌同志已率部队和大部分干部六百余人撤离竹沟来到四望山，同我和陈少敏等同志一起，召开了豫南、鄂中、

鄂东的党和部队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与指挥问题。当时，我们同日、伪、顽分割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很激烈，党的各种力量如果不统一领导，协力战斗，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消灭的危险，所以统一边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四望山会议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建立新的鄂豫边区党委，统一管理原豫鄂边区党委、鄂中区党委和鄂豫皖省委鄂东地委的党的工作，由陈少敏同志任代理书记。同时将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立了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纵队委员会，由朱理治同志任纵队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我任纵队司令员，刘少卿同志任参谋长，任质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朱理治同志回延安，由任质斌同志代理政委和书记职务）。至此，鄂豫边区的党组织和部队实现了全面统一。

1940年8月1日，我们在白兆山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大会。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个别领导干部的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的错误倾向。我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部队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的重要意义，并对不服从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个别同志进行了批评。经过这次会议，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边区党对军队的领导。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发布命令：陈毅同志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新四军部队整编

为七个师。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任命我为师长兼政委。6月间，五师在白兆山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切实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这样，新四军第五师就成为一支驰骋中原敌后战场的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 六、要写人民群众的支持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鄂豫边区是孤悬于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又被日、伪、顽分割为几十个“豆腐块”，敌、顽、我“三角斗争”十分激烈。在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里，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要生存和发展，要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边区的抗日人民战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民兵、自卫队为基础，以主力部队为“拳头”，去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在群众的支持下，五师的部队善于独立作战，几个干部带上一支小的部队就能在敌后同敌人扭打。地方干部也会打游击。当敌人向我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常常有人向我报告，说是某某县委书记不见了，某某区委书记“失踪”了，某某部队被敌人包围了。我就讲：“不要紧，敌人退了，他们就会钻出来的。”果然敌人一退就都钻出来了。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在同日、伪、顽只隔一条路或一条河的“三角斗争”地区设立医院，安置伤病员，住上几个月或者一年，敌人也发觉不了。我们的部队得到边区人民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在敌、伪、顽夹击中，无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打运动战都很自如了。

这种奇迹的出现，当然首先是因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它的群众基础很广泛，但同时也是和我党我军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分不开的。这里的人民群众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在抗战中，我党我军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在根据地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农业低税制，减少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增加经济收入。直到今天，安陆县还保留着当年修的汪公渠，湖区保留着围田，山区保留着这个塘、那个堰。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进行群众战争动员，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工农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抗战和生产两个积极性。这是五师取得生存发展、夺取胜利的一个基本因素。

### 七、要写团结是争取胜利的保证

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东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而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汇合豫鄂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力量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武装力量大小不一，开始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战，互相间没有或者很少联系，但是在党

的领导下，经过几次整编统一起来之后，都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没有什么山头之分，门户之见。虽然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经过批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都比较好地解决了，始终没有影响团结和战斗力。

五师的干部，真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其中，一部分是参加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干部，约有一百多人。这些同志大多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来的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在当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一部分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这些大城市沦陷前后撤退出来的白区党的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这两部分干部是部队的主要骨干。再就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中新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此外，钱瑛同志也给我们输送了一些干部。党从重庆还派来了一些干部。我们对于干部的使用，是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为数不多的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大都放在团以上主要军政领导岗位。他们在作战和建军中起带头和骨干作用。同时又配备了一批有党群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由于五师部队发展很快，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我们又通过办教导队、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培养了大量新的军政干部。这些人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富有创造精神，经过老同志的传帮带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很快就成长起来了。总的来看，五师在处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这里



我还要说一下，五师知识分子干部是很多的，他们为五师和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师干部来源这样广泛，各自出身不同，工作环境各异，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都能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爱护，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努力奋斗。

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写史时，应加以充分反映。

#### 八、要把竹沟的作用写够

应该把竹沟的作用写够。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机关曾设在竹沟。竹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中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个立足点，又是新四军发展的出发点之一。新四军4支队8团队，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的基干部队，都是从这里出发，汇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河南省委在这里办过教导队、党训班，先后培养了三千余名青年干部，扩大了留守处的基干武装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开展了很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时，在竹沟住过一个时期。在竹沟工作过的还有朱理治、陈少敏、彭雪枫、王国华等同志，健在的有周骏鸣、张旺午等同志。

七里坪留守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是在这里集结后东进抗日的，5大队、6大队也是从这里开始发展起来的，湖北省委在这里还培训了一批